

于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还很落后,在校教育还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大学生、研究生只占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多数青年和其他群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自学。如何指导这些读者自学呢?这是一件大事。当然,报刊上经常发表书评和读书心得体会是必要的,但经常发表各种专题书目,对指导读书更是十分重要的。大学教授带研究生,并非天天手把手地教,而是给学生定下研究课题之后,就给学生开列一大堆书目,由他们自己根据这个书目去找资料,去自学、研究、写论文。我想,如果这个老教授的书目单子能拿出来发表,也供那些没有读研究生的机会的青年自学,他不是可以带出成百上千的研究生吗?其贡献不是大得多吗?给读者开书目并非易事,必须是深通学术的人方足与此。章

学诚在《校仇通义》里说:“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余嘉锡说:书目工作“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我国的一些优秀古典书目就都出自硕士鸿儒之手,只有象他们博通群书,深明道术,才能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为读者开书目。现在,我国许多老教授、老专家辛勤钻研一辈子,各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里博大精深,但都已到烈士暮年,应该将他们的知识财富尽量多地留给后人,其中,将他们的研究、摸索了一辈子学术所得的书目留下,乃是一笔极宝贵的财富啊!因此,出版社和刊物经常为读者发表或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目,很有必要。

从《全国报刊索引》分类表的修订谈 图书和资料分类法“三性”的辩证关系

黄恩祝 李光达

为了使《全国报刊索引》能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上海馆索引组对索引的分类法进行了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革命就没有科学,分类法应以思想性为主;思想性可以代替科学性和实用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分类法的‘三性’不能彼此代替,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时代中‘三性’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主次的关系”。我们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我们认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比较集中反映我国解放后关于如何编制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的许多争论的要害,因此开展这方面的争论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探讨性的意见,供大家讨论参考。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

五十年代苏联图书馆界在大争论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分类法,但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的“三性”关系应如何从理论上阐述,从实践中解决却没有做到。

五十年代末苏联图书馆界曾爆发了一次关于分类体系的论争,这个争论是围绕列宁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基本序列进行的,中心问题是分类法该不该把马列主义排在基本序列之首,论争双方的基本论据是:

同意的一派认为: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社会

科学的指导思想，其辩证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因此，把它排在基本序列之首既符合理论上的要求，也符合社会客观实际。他们认为分类法要解决的不是哲学和理论的问题，而是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实际用途的分类法。他们的基本序列是：马列主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杰斯林科。

反对的一派则认为分类法的序列应根据恩格斯对物质运动形态分类顺序，其中心观点就是科学类分才是分类法的基础，图书馆工作的思想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分类目录。他们的基本序列是：辩证法——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凯德洛夫。凯德洛夫为此曾把马列主义、辩证法、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五大类分别进行六种不同的排列，最后并提出一个他认为比较合理的交叉式的基本序列，即在辩证法之下分两个并列的大部类：Ⅰ部类的顺序是辩证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Ⅱ部类的顺序是马列主义——辩证法——人文科学。这个交叉式的分类法在应用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其实质还是反对马列主义排在基本序列之首。

这次论争很快传到了我国，并在我国图书馆界引起了一场相同的大争论。如何估计这场争论的意义及其影响呢？我们认为：

这是一次为捍卫分类法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性而进行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争论。毫无疑问，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类法都把代表其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排在基本序列之首，为其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进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分类法难道不应该把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冠于基本序列之首吗？难道不应该宣传社会主义时代领导阶级的思想理论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年代里，有些人对这个十分简单的真理一时竟糊涂起来了。他们竟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

应该挂分类法的帅，这样，这场争论就是一场带原则性的争论了。争论的结果是同意的——一派胜利了。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分类法，从这点而论，它的确建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但是，这次论争也派生了一个“左”倾思潮、即认为思想性可以取代科学性和实用性。当时杰斯林科一派就认为：要贯彻分类法的党性必须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冠于各大小类目之首，必须设置区分阶级观点的类目；必须在国分表中注入政治因素等等。这些做法开始把分类法中的思想性绝对化了，从而导致分类法科学性的混乱和实用性水平的降低。这股风不久也在我国吹开来了。1959年一篇题为《图书分类表五分法中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之前的看法》的文章认为：“图书分类法是基本上利用科学分类法原则，同时必须根据适合无产阶级立场的一些补充规律变通运用，例如，在一般公认的一些科学分类原则及其具体的安排顺序上，必要时则用反排倒置及突出等方式来予体现。我们的变通原则是以马列主义学说为主、以无产阶级为主、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以今为主、以中为主、以群众的创造为主、以进步事物为主、以科学最高成就为主、以计划经济重点为主、可以由人到物、由近到远、由亲到疏……这些变通，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图书分类实践的补充原则而被运用着。”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虚晃一枪，其实质是在下半部，即根据政治需要可以把分类法加以“变通运用”。变通的深度相当惊人，这“九个”为主实际上导致了分类法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严重破坏。这篇文章的提法很有代表性，它是苏联分类法基本序列论争以后派生的那股“左”倾思潮的典型。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在我国横行十余年，分类法的编制在其影响下“左”得更明显了。如我馆编制的《全国报刊索引》分类表，其动态资料不按资料的主要主

题集中，而按资料的党政机关级别集中；其国别表不按各国在各大洲的位置进行排列，而按三个世界的理论，再按由亲及疏的变通原则排列，其结果，国家的位置与大洲脱离，各国的位置时前时后，大大降低了索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有些同志看到这种“左”倾的危害，为了反对这个倾向，却又滑向另一个倾向，企图以科学性代替思想性和实用性，这种在两个极端中摇摆不定的现象，说明社会主义时代的“三性”关系应如何正确处理还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得到解决。

二

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的“三性”
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的“三性”关系 不是主次关系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类法都有代表其统治阶级思想理论基础的思想性；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也应该有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基础的思想性，这是理所当然，无容置疑的。但是，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的“三性”关系应如何认识和处理才是正确的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主张应该有主有次，正如社会主义前时代分类法一样，甚至认为可以其中一个属性代替其他两个属性。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社会中，“三性”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关系而不是主次关系。理由如下：

“三性是彼此对立的，不能相互代替，这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

《矛盾论》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分类法中的“三性”也是如此，思想性指的是分类法的政治指导思想；科学性指

的是类目设置的科学基础；实用性指的是读者检索的方便，它们三者各有其特殊本质，不容混淆，不容彼此代替。思想性不能代替科学性和实用性；科学性不能代替思想性和实用性；实用性也不能代替思想性和科学性。这个“三性”对立的观念很重要，每种事物都有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这个规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一样。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工作可以冲击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有些同志的确幻想以思想性取代其他二个属性建立一个只有思想性的分类法，他们最起码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这个哲学上的基本常识。

“三性”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个特定社会中可能而且应该是彼此依存、彼此转化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时代区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已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正在逐步实现，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这就创造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发明以及社会各种措施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在当前就是为实现四化而奋斗。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反映到我们的分类法中，其“三性”关系十分明显，那就是它们既有对立的一面，但由于它们是处于社会主义时代这个特定社会的共同体的内部，因此，它们又有彼此依存和彼此转化的一面。而彼此依存、彼此转化的一面是最生动和不断运动的一面，它是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不断发展完善的动力，是编制分类法应特别重视的因素。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如能探索得更完整、实践得更出色，则分类法的编制一定更富有生命力。

“三性”的关系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中，就社会主义时代整个过程而论，它们不是主次关系，而是辩

证关系

《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中要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又说：“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这两段话说明：①、许多矛盾同时存在时，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②、主要矛盾仅存在于各阶段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处理我国阶级关系的政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未被变革之前阶段完全是正确的，但林彪、“四人帮”把这个政策变成“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的长期政策，于是，一个新生的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几濒于崩溃。这一惨痛的历史当然不仅仅是对哲学原理的歪曲，他们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这个巨大的阴谋而有意导演这一齣“哲学的贫困”的悲剧。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时代的图书资料分类法的关系时决不能上“四人帮”的当。

如何处理分类法“三性”的辩证关系

思想性不能以单独的形式出现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的内部，思想性不应以单独的形式存在，在考虑分类法的思想性时应同时研究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能为了要突出思想性就削弱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相反地，为了要加强思想性，就应该进一步研究它与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联系。我们试从上图近年来编制的三个《全国报刊索引》分类表的“中国工业交通”的政治类目的设置来说明。

A、目前我馆索引组使用的分类表“工交政治工作”可入的类目有三处：

甲、H1党的领导 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工交政治工作的指示或人民日报有关工交政治工作的社论入此。

乙、H13党的地方组织的活动 省委及省报社论关于工交政治工作的指示

等入此。

丙、H14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 工交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活动入此。

B、去年修订时供讨论的一份分类表“工交政治工作”类目可入五处：

甲、G1党政领导 党中央的指示入此。

乙、G12党政对政治工作的领导 人民日报社论入此。

丙、G14地方党政领导 地方党政领导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入此。

丁、G15基层领导 基层党政的政治工作入此。

戊、G2政治工作 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入此。

C、去年修订时供讨论的另一份分类表可入的类目只有一个，即“工交战线的政治工作，”这个类目容纳自中央到基层关于工交战线的一切政治资料，排列法先中央后地方再基层。

从A、B两表中可以看出，分类表的编制者希望通过多设置政治类目来强调它的思想性，并企图在每一大类最前部分设置各级党政机关的类目来强调党的领导，其实由于过多设置同一性质的类目，非但大大削弱了全国工交战线政治工作资料间极其密切的逻辑联系，同时由于同一性质的资料分散多处，读者检索十分困难，显然，其实用性也大大减色。

C表中工交战线的政治工作列于一类之首，思想性十分突出，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工作资料集中于此，这样就比较紧密反映同一时期政治工作的资料逻辑关系，因而它的科学性比较强，它的实用水平也比较高。

从上述两种类型的分类表可以明显看到，要加强分类法的思想性，必须同时重视研究它和科学性、实用性的联系。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粉碎

“四人帮”以后，政治工作必须落实在业务上，这个提法又重新提出，所谓“落实”并不是数学的等号，而是化学的合成，那就是政治工作必须结合业务工作一起进行才能显出它的生命力，发挥它的指导作用，脱离了业务它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分类法的思想性也是如此，它必须和科学性、实用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科学性不能以单独的形式存在

在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中科学性不应以单独的形式存在。在考虑类目设置的科学性时，要同时考虑它与思想性、实用性的关系。

专业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分类法应有所不同，前者需按其专业进行详细的科学分类，这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实用的，而后者如果也采用这种分类法就不实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在研究分类法的科学性时，不能单独从科学性本身出发考虑，还必须考虑它的实用性。

有些同志在吃过“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苦头后，的确想建立一个不受政治运动影响的分类法，他们提出：今后的分类法不要按阶级观点设置类目。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图书都标明作者的阶级观点，这对图书馆员来说是一个伤脑筋的事。但我们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在分类表中应有鲜明的阶级观点，所以设置鲜明阶级观点的类目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了适应许多尚无定评或难以定评的作家及其著作，我们可设置按国人类这种类目，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显然想建立一个没有或较少思想性而只有科学性的分类法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实用性也不应以单独形式存在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中，实用性也不应以单独的形式存在。我们在研究分类法的实用性时，必须同时考虑它和科学性、思想性的联系，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要提高它的实用性以方便读者，而置思想

性和科学性于不顾。有人认为分类法就是索引法，即认为只要达到读者检索方便的目的，就是最好的分类法，显然这也不对。一个只要实用性而没有思想性的分类法是没有政治方向的。一个只要实用性而没有科学性的分类法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编纂社会主义国家的分类法，对实用性重视不够甚至有人认为实用性就是实用主义，因此对此问题视若禁区，不敢问津。其实这是对实用性的一种歪曲，讲究实用性并不等于就是实用主义，如认为实用性就是功利主义，那还说得过去。从来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功利主义。“古为今用，外为我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唯心论大师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列宁赞同在新生的苏联工矿企业中实行美国资本家阶级的生产管理方法——泰罗制；毛泽东同志提出对古代的文化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革命导师身体力行的这些史实说明，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允许从自己的阶级和敌对的阶级继承或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用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图书馆界一直把实用性视为禁区，以致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重大的突破，这是十分误解。其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用性还有更广泛更积极的含义，它经常是思想性和科学性的最终检验者，试想当一个读者能更快，更准确地检索到他所需要的图书或报刊资料，从而能更快更好去完成政治或科研任务时，这难道不是实用性的作用吗？我们不能片面认为方便读者仅仅是读者个人的小事，与大局无关。这是“小生产者”的观点。实际上图书——情报系统的效率，是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简单地把检索资料的实用性看成是读者个人的事，不屑一谈，是非常错误的。

“三性”的辩证关系受到直线式分类结构的很大限制

一般常见的分类法是直线式结构的。所谓直线式分类结构就是各个类目间的联系只有一条线，类目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没有横的关系，即只反映一种联系。但是客观事物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以一种关系来归纳千变万化的联系是办不到的，因此，“三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过去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孰前孰后的论争，主要受限于直线式这个结构的不合理。在直线式这种结构中，我们对类目设置的顺序多是着眼于类目间最基本或最主要的联系，次要的联系只能以“互见”或“参见”等方式来加以补充。

三

我们的一个初步的实践

我们是搞报刊资料索引工作的，在工作中深深觉得，报刊反映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中的最新资料，是实现四化很重要的参考工具。搞好报刊资料索引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何才算搞好，工作是多方面的，但是索引分类法的编制却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环。我们在探讨分类法“三性”的辩证关系时，结合工作实践，初步尝试编制一个报刊资料索引分类表（社会科学部分）现把我们几个主要作法介绍如下：

1、我们的分类表是一部分采用主题分类，一部分采用《中图法》。

我们认为报刊除了以定期（或不定期）有连续期号这两个特点区别于图书之外，另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大量的社会动态资料。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中的重大事件，这是图书所没有的，这些事件的关系与学科间的关系不同，而是三大领域经常出现的政治与生产（业务）中的各种事件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科学的关系，因而不能使用图书分类法，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是领导一切的，在报刊动态资料索引的分类中应以最显著的类号设置。

但《中图法》却把她置于社会科学——政治——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这些类目之下，根本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生活需要。报刊动态资料索引的分类法不能同图书分类法熔于一炉，必须重起炉灶。但是报刊中的论文资料却与图书的性质是一致的，它完全可以采用图书分类法，因此我们尝试把报刊资料索引的分类表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实践资料”，按主题分类；第二部分是“科学理论资料”，按图书分类法分类。为了和第一部分的类号有所区别，第二部分各类类号前各加“L”（意即理论资料）这个做法有两个好处：①动态资料按主题入类，便于查检。②理论资料类号与图书类号一致，可减轻读者记忆类号的负担。

2. 我们不以党政机关为主题来设置动态资料索引的类目。

我馆原来的报刊资料索引分类法是以各级党政机关为动态资料索引的各大类的共性，把各级党政机关作为二级类目置于各大类最前面，这样就使同一性质的资料经常因为党政机构的级别关系而四分五裂。如今年全国造林造林的规模很大，各级党政机关都参加这一活动，造林造林被分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各省市革委、各基层组织以及造林造林等各类。这种工作方法其实是党政机关资料室的工作法，它完全不适用于面向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报刊资料索引工作。原来我馆报刊资料索引这种分类的方法已给分类工作和读者使用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反对这种分类的方法。我们认为一般各类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业务）工作，这个共性概括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下的全部工作，这个共性的概念与社会生活实际是一致的，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因此，以这样一个概念来分类资料，既可避免同一性质的资料四分五裂，又容易为一般人所掌握，为查检资料大开方便之门。因此，

我们舍弃那种以各级党政机关作为各大类共性的分类方法，而在军事、经济、工交、财贸、科学文化、文艺、教体卫等大类下分设“××战线政治工作”与“××业生产（业务）管理与建设”两大部分，然后再按主题设置类目；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中国军事三大类中以工作范围的主题确定类目；在外交、国际两大类中以国家为对象确定类目，这样就使类目的确定和动态资料内在联系规律大致吻合。

归纳上面的论述，我们的主要论点是：社

会主义时代前的分类法“三性”的关系是主次关系，而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三性”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关系。我们在编制分类法时一定要重视这个特点，周密研究“三性”相互间的关系并尽量使之和谐完善，这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分类法的“三性”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我们限于政治、科学和文化水平，再加上实践经验很少，因此，对许多观点的论述很难深入，错误更在所不免。这些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浅谈《图书馆学辞典》

张文彬

自从我参加图书馆工作以后，由卢震京先生编辑、刘国钧教授校阅的《图书馆辞典》，一直是我日常工作中常用的参考工具书之一。然而，就是这部辞典，在它刚刚问世不久（1958年9月，商务出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有组织的批判文章，抡起大棒向卢先生及这部辞典打来，就连校阅者也未幸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告诉我们：《图书馆学辞典》不是“一株大毒草”，它是我国在图书馆学辞典方面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不但没有“给我国图书馆界带来恶劣的影响”，相反，却给我们这些图书馆工作人员带来不少方便。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当推倒，卢震京先生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图书馆学辞典》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卢震京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在抗战以前就编写了一部图书学大辞典，但国内所存寥寥无几。解放后，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在1956年党和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以后，图书馆界迫切需

要有关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的工具书，正如卢先生所说“许多朋友以及图书馆界诸同志”都劝他将图书学大辞典原版重印，以应当前的急需。但卢先生对自己的旧编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他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辞劳苦，利用业余时间，对图书学大辞典进行修订，增加了解放后的新材料，补充了过去遗漏的材料，删去已失时效的材料。但由于篇幅过大，加之时间紧迫，卢先生不得不将原书分别以专书形式出版，《图书馆学辞典》就是原书的第一部分。遗憾的是，在《图书馆学辞典》遭到全盘否定之后，原书的第二、三部分《目录学辞典》和《书史学辞典》，终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说《图书馆学辞典》是一部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工具书，首先在于它取材非常广泛。正如刘国钧教授所指出的：“新旧图书馆学著作，不管专书、小册、论文、表格、自著、翻译，也不管铅印、雕版或油印，都在采取之列，真可说是‘博采兼收、搜罗宏富’。各种术语，不管是过时的，现行的，我国固有的，外来翻译的大概都可以在